



簫劍集

梁归智……著

山西教育出版社



梁归智……著

箫剑集

山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箫剑集／梁归智著，—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0.10

ISBN 7—5440—1828—8

I. 箫… II. 梁… III. 古典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文集 IV. I 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2510 号

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迎泽园小区 2 号楼)

晋中印刷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382 千字 印数：1—1500 册

定价：28.00 元

《萧剑集》 内容简介

本书是著名红学家梁归智教授继《〈石头记〉探佚》、《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新评新校〈红楼梦〉》三种专著之后推出的又一种学术著作。这三种著作都有较大的发行量和广泛的社会影响，是学术著作中不多见的。现在这本新著具有更鲜明的特色，收入作者最新的论述《红楼梦》和其他古典小说的文字，既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又具有严肃的学术性，同时文字优美，富有诗意，有很强的可读性。此外本书还附有作者近三十年来创作的诗词作品，反映出他由红卫兵、下乡知青、文革地下文学创作者到著名学者的曲折而有趣的人生经历。因此，本书不仅适合于古典文学研究者和一般的文学爱好者阅读，也对了解文革、下乡知青那一段特殊历史具有参考价值。

目 录

箫心剑气说《红楼》

——自序…………… (1)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

——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 (5)

读《红》拾遗…………… (19)

爱是什么

——从《红楼梦》到《英儿》…………… (25)

从童话诗人到撒旦

——顾城悲剧分析…………… (36)

《红楼梦》精神结构说…………… (47)

跨世纪红学之反思笔谈…………… (59)

关于“红学探佚学与结构论”的对话…………… (67)

探佚的空间与限度…………… (75)

数学家与红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82)

凸显出中华文化的浮雕

——读《曹雪芹新传》…………… (87)

伟大也要有人懂

- 读《红楼艺术》 (92)
- 神貂之尾与维纳斯断臂 (99)
- 学术范型的意义 (105)
- 周汝昌红学五十年感言 (112)
- 艺术精品·学术妙品·文化珍品
- 十集京剧电视剧《曹雪芹》观后 (128)
- 哈尔滨国际《红楼梦》研讨会随笔 (135)
- 《红楼梦》与土地 (145)
- 《红楼梦》人物赞 (152)

浪子·隐逸·斗士

- 关于“元曲”的评价问题 (210)
- 元曲的人文精神与审美范型 (214)
- 三晋元曲 (243)
- 诸葛亮形象的文化意义 (266)
- 论《三国志演义》中的“知遇之感” (272)
- 说“韬光养晦”
- 华夏文化的存在方程式 (285)
- 解构《三国演义》：一种现代性读法 (293)
- 自由的隐喻
- 《西游记》的一种解读 (303)
- 董若雨和《西游补》 (321)
- 《金瓶梅》的欲中之情 (327)
- 女娲·妲己·性畏恋
- 对《封神演义》一个基本情节的解析
- (336)

“儒道互补”的最后一次闪光	
——《儒林外史》的历史张力	(352)
侠客的踪迹	
——谈武侠小说的演变	(359)
论武侠小说的基本特征	(371)
《镜花缘》的“二律背反”	(379)
向历史门槛跷脚的女人	
——谈《孽海花》里的傅彩云	(391)
古瓶集	(402)

萧心剑气说《红楼》

——自序

我曾经说过一些似乎很狂妄的话。如说从思想境界、精神气质的角度,老一辈中只有周汝昌、胡风和鲁迅这“两个半”人真正读懂了曹雪芹的《红楼梦》。又说红学史上名符其实的突破其实只有两次,一次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发轫的“新红学”,另一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兴起的“探佚学”。这两次突破的基本点、共同点就是严格区分曹、高“两种《红楼梦》”。“探佚学”是“新红学”走到迷惘的十字路口徘徊三四十年后向前跨出的决定性、方向性之一步。我这些看法都来源于一个朴素的思想,即我以为要“读懂”《红楼梦》,除了版本鉴别和家世考证等技术性、背景性的前提之外,最根本的一条是读者必须具备与曹雪芹比较接近的气质性情,然后才可能本真地进入原著《红楼梦》的精神结构之中。而且,版片考证等也不是纯粹“科学”性的操作,而必然受到研究者个人气质性情的影响。比如贾宝玉的别号到底是“绛洞花王”还是“绛洞花主”,就不仅涉及版本的对勘鉴别,更和理解曹雪芹创造贾宝玉这个“千古未有之一人”的精神思想内涵有关,研究者如果不能和曹雪芹、贾宝玉灵犀暗通,就不可能对“绛洞花王”的妙处心领神会。

以此观照百年红学史,基本上是一部对《红楼梦》的“误读史”。考据之外的“评红”,其主流、大势是错把高红当曹红,假作真时真亦假。从胡适到林语堂,从苏雪林到高阳,以及众多拥高派红学家,在文本认同方面竟如此愚钝——这个词有点唐突前贤时彦,却实在恰如其分,毫不夸张。这些“名家”、“大师”的艺术感觉、文字鉴赏能力居然与曹雪芹的灵心慧性隔着一道万里长城,却与后四十回续书阡陌相通!这种“《红楼梦》现象”不由得不得不让人感叹人情

物理的复杂曲折,大千世界的陆离光怪。让我们聆听一下这些“大师”们的言说:

“我常说,《红楼梦》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儒林外史》……《红楼梦》……在文学技术上比不上《海上花》(韩子云),也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胡适

“高本作者才学经验,见识文章,皆与前作者相称。高本文学手眼甚高,有体贴入微,刻骨描绘文字,更有细写闺阁闲情的佳文,似与前八十回同出于一人手笔。”——林语堂

“原本《红楼梦》文笔之恶劣,出人意想之外,真所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不过天下事无奇不有,竟有一个不学无术的没落纨绔,写了一部散慢松懈,毫无结构,并且尚未完稿的小说,居然脍炙人口,传诵一时,让他享受一百五十余年的盛名。”——苏雪林

“将一部完整的《红楼梦》,硬劈成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分别研究,以致永远在摸索、试探、猜测,我很欣幸我可以说得上有丰富的小说创作经验,确信‘绝无人可续红缕’,以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看待。”——高阳

看了以上的大师级言说,你能说“百年误读《红楼梦》”不是一个让人难以相信却残酷地客观存在着的事实吗?我还没有提到蔡元培等索隐派诸家的各种陈说以及近来的“脂批本伪造”、“竺香玉谋杀雍正帝”等新说呢

为什么竟会是这样?

《红楼梦》第五回中警幻仙姑给贾宝玉作“鉴定”说,他是一个“天分中生成一段痴情”的人,这也就是第二回里作者借贾雨村之口阐发的“正邪两赋之人”。“痴”或者“正邪两赋”究竟是什么样一种气质性情呢?再换一种说法,大概就是所谓“箫心剑气”吧,也就是“诗人哲学家”一类人物吧。也许有人会质疑,“箫心”或与“痴”相通,“剑气”是否牵强呢?其实“箫心”与“剑气”是相反相成的,有

“箫心”则必有“剑气”，贾宝玉也有“情极之毒”，正同于柳湘莲挥鸳鸯剑先削发而后“作强梁”也。此所以贾宝玉有“三王号”，绛洞花王原直通混世魔王与遮天大王也。

我曾经赋赠周汝昌先生一首绝句：“吟鞭一指傲三秋，重镇红坛大纛周。小卒过河发妄语：痴情方许说红楼。”要论说《红楼》，是要有一点“痴”，有一点“箫心剑气”的。

明白了这一点，百年来《红楼梦》接受美学的怪圈，也就捅破窗户纸一般透明了。上述的大师们虽然个个建功立业，彪炳史册，却实在都不是“正邪两赋之人”，质素中偏偏缺少了要进入《红楼梦》不能缺少的“痴”或曰“箫心剑气”。难怪曹雪芹早已预言性地写下“都云作者痴，谁解痴中味？”的深沉慨叹！（据俄罗斯圣彼得堡本《石头记》，“谁解其中味”作“谁解痴中味”。）

从八十年代初至今，我和曹雪芹、《红楼梦》的缘分，算来也结了二十年了。我撰写过四册考论《红楼梦》的著作：山西人民出版社初版、山西教育出版社增订版的《〈石头记〉探佚》，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被迷失的世界——〈红楼梦〉佚话》，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新评新校〈红楼梦〉》，尚未找到付梓之处的《〈红楼梦〉诗词韵语讲论释义》。听我讲过《红楼梦》的学生，也可说是“弟子三千”了。回顾二十年的红学因缘，我其实只是在反复地申说着一个简单的道理：探佚方知真红楼，痴情方许说红楼。这里奉献出的又一个集子，除了言说《红楼梦》的部分之外，尚有接近一半的篇幅是表面上无涉于《红楼梦》的内容。我说“表面上无涉于”，也就是说它们实质上“有涉于”，而且是千丝万缕地互相牵扯纠缠着的。有两个年轻的朋友读了《古瓶集》后对我说：“你研究《红楼梦》，和你写了这些诗有密切关系。”又有人对我说：“你论元曲的‘浪子·隐逸·斗士’，不也和‘正邪两赋’一脉相通吗？”仔细想一想，还真是“知音解味”之言，让我服膺。

那么，“关系”、“相通”在何处呢？大概就是“痴”，就是“箫心剑

气”吧。读者可以检验,“痴情方许说红楼”这把玉尺是否也可以衡量笔者的本质,“红楼”之外的文章和诗词于解读笔者对《红楼梦》的研究是不是存在一种内在的精神张力。

“两种《红楼梦》”的区别其实就是先锋文学、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学的区别。先锋与精英总是少数,他们的情怀、襟抱、思致、境界不是人人能够轻易了解和共鸣的。通俗的东西却往往有着广大的市场。而生活的辩证法又十分有趣。比如上面提及的“大师”们似乎应该属于精英和先锋的行列,他们却表现出通俗的审美取向。而我遇到的一些“民间”人士,却一下子就与曹雪芹的高山流水梦通神通。“痴”和“箫心剑气”也真是一种可遇而不可求的缘分呢。

因此,老实说我对“红学界”不抱太大希望。“红学界”可以在资料整理和考据等方面做些基础性工作(这当然是必要的、重要的),但要与曹雪芹的心灵交流契合,要让《红楼梦》的本质真谛融入民族气质的智府灵宫中去,要让曹雪芹和《红楼梦》成为民族性的文化支柱,要让大观园成为新世纪中国人的一个精神家园,那只有走向民间。我因此提出“人间红学”的设想,从“探佚学”到“人间红学”,乃是一件需要许多人献身的创造性工作。编辑自己的集子,却想到这样一些话,是“题外”呢?还是“题内”呢?

我的阳台外面,长着一株柳树和一株杨树,都已经有好几十年的生命史,大概要超过我的岁数了。春天新绿葱茏,有鸟儿飞来筑巢啁啾,秋天纷纷黄叶,鸟儿也飞走了。一元复始,情景交融,常让我想起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和鲁迅先生的名句:“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如今,我要告别我的杨树和柳树,到海边去听涛声浪语了。这本著作也成了我告别故乡的一个纪念。它的出版受到山西省出国留学基金的资助,是要特别表示谢意的。

1998年12月31日于山西大学杨柳斋

《红楼梦》研究的意义

——世纪之交检讨“红学”

很快就是下一个世纪了，尽管公元的纪年法属于基督教文明，但因为现在已经是地球村的时代，所以大家在心理上都把公元两千年作为“槛”和“限”来对待，各个学科都纷纷反思、回顾、总结、瞻望，尤其是针对过去一百年的历史和发展。鉴往知来，这是古训和通例。借着纪元的交替，把工作乘机推动一下，也是人类的智慧。

作为一个颇有影响的中华人文学科，红学也恰恰走完了近一百年的历程。对红学作沉思检讨，已经有周汝昌先生《还“红学”以学——近百年红学史之回顾》发表。笔者不揣鄙陋，想主要从红学或《红楼梦》研究的“意义”这一层面提出一点看法。

考据：红学已有的实绩

诚如周汝昌先生所言，够得上学术的“红学”应该从胡适作《〈红楼梦〉考证》算起。^①

红学以“考证”开头。不带任何门户之见和意气用事，应该承认，近一个世纪来红学最重要的实绩是在考证方面。

胡适和俞平伯为代表的“新红学”之核心是“考证”和“辨”。他们从发现带有批语的《石头记》抄本的研究开始，考证出行世的《红楼梦》其实是“真假合璧”——前八十回为曹雪芹著，后四十回为高鹗续。这一点胡适自己在晚年曾有很实在的夫

子白道：“我是曾经在四十年前，研究《红楼梦》的两个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作者的问题；一个是《红楼梦》的版本的的问题。”（《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

后来居上的周汝昌的奠基之作《〈红楼梦〉新证》，其主体“是一本关于小说《红楼梦》和它的作者曹雪芹的材料考证书”。

六、七十年代另外两位著名的红学家吴世昌和吴恩裕，其代表著作《〈红楼梦〉探源》、《有关曹雪芹十种》，从书名标目已经可知其注意重心所在。

80年代直到90年代多次红学讨论的热点，一时“小像”，一时“石兄”，一时“墓石”，一时辩驳脂批本的真伪，一时又争论曹雪芹的祖籍是“丰润”还是“辽阳”，乃至《红楼梦》研究所的主要成果《红楼梦》新校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汇校》和《〈红楼梦〉大辞典》以及冯其庸《曹雪芹家世新考》、郭豫适和韩进廉的两部红学史著作、王畅《曹雪芹祖籍考论》等的出版，都显示出红学的兴奋点大体上仍然没有背离胡适所标榜的“考证”路标。

海外的红学研究也不例外，从赵岗到潘重规，从周策纵到唐德刚、柳存仁，其真正的贡献其实仍不脱考证的范围。

尽管仍然争论不休，但应该说，近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版本和它的作者及其家世等材料的发现、整理、辨析和考证的成绩硕果累累，有目共睹。这些考证的成绩为深入《红楼梦》的文本意义提供了基础。

义理：“意义”之障蔽

但《红楼梦》文本的意义始终在云笼雾罩之中，从来没有真正地“敞开”过。

清末民初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其真实的学术价值十

分有限，它仅仅是牵引来西方某种哲学思潮框套《红楼梦》这部中国古典小说，从“引进”角度而言，自然有其意义，但意义也就仅此而已。从“学术”质素而言，其实难以称道。笔者在《〈石头记〉探佚》中有专文论析，这里从略。

胡适与俞平伯在《红楼梦》“义理”上，所达到的只是该书写曹家“坐吃山空”、“自然趋势”或“感叹自己身世”、“情场忏悔”这种认知，其肤浅也显而易见。“自传说”从《红楼梦》的基本质素认定上很不错，在文本内涵“意义”的开掘上，胡、俞却都从未深入，极不深刻。胡适晚年云：“《红楼梦》在思想见解上比不上《儒林外史》——也可以说，还比不上《老残游记》。”（《谈〈红楼梦〉作者的背景》）俞平伯在受到批判后，对《红楼梦》的思想艺术不再发表意见，而其晚年“大彻大悟”的意见却是“只是一部小说”、“高鹗有功，胡适、俞平伯有罪”云云，可见其识力本来并不透彻。

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红学基本上成为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从李、蓝二人的“四十年间半部书”，到洪广思的“阶级斗争形象史”，已基本上逸出了学术的范围，而成了政治的婢女。其中当然也能过滤出一些“合理因素”，但不成比例，除了某种历史认识的价值之外，裨益于后学的质素实在不太多。

这一期间有何其芳与蒋和森的红学论著曾对那一时代的青年产生过很大影响。但这种影响的实质是何、蒋二人的著作在俄国文艺批评家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罗留波夫文艺思想的影响下多少显示了一些“人性论”的温馨感性色彩，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因而对当时“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氛围那呛得人喘不过气来的“火药味”有所缓冲，对《红楼梦》的内在价值之真正学术性的认知则有根本缺失。一个明显的标志是他们的论著之立论都不区分前八十回曹雪芹原著和后四十回高鹗续书。^②

到八九十年代，从数量上观照，仅从80年代开始出刊的

《〈红楼梦〉学刊》来看，涉及《红楼梦》“文本”的思想、艺术、人物、审美等方面的文章也发表了不少，这方面的专著之出版也数以十计。表面看来，引进了各种“新思潮”和“新方法”，与80年代以前思想禁锢的时期比，可谓丰富多彩。但从一个历史的层面考察，这些出版物的大多数（不是没有，但不多）对《红楼梦》的“意义”之彰显并未有突破性的建树。这与中国社会转型初期的思想之不成熟是互相对应的。

有趣的是，号称“思想自由”的海外红学界，其对《红楼梦》“意义”之认识，则更为浅薄。仅举林语堂《平心论高鹗》和苏雪林所说“原本《红楼梦》文笔之恶劣，出人想像之外，真所谓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不但说不上一个‘好’字，而且说不上一个‘通’字”（《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即可见海外的“水平”了。当然也有个别独具慧眼的红学研究者，如李辰冬和宋淇，但他们的影响还未达到开风气、领风骚的规模。

《红楼梦》的“义理”、“意义”对大多数红学学者而言，是晦暗不明的。近百年的《红楼梦》研究，缺少的是灵魂，是主体精神，是文化哲学。这种情况其实有其历史的必然性，它是受共生的中国之具体历史和思想情境所制约的。

症结：曹、高优劣之辨

这种“意义”的障蔽其突出表现就是对曹雪芹原著和高鹗续书“两种《红楼梦》”孰优孰劣长期以来纠缠不清、反复争论而没有结果，并由此而衍生出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论战”。

按说，从胡、俞以来，前八十回与后四十回的区别在考证的层面已经完成，鲁迅在其小说史和杂文中已经论到了二者的“绝异”和“殊不类”。照一般的“顺理成章”，下一步就是探索二者之间的“意义”之差异了。可是从胡、俞以降，到李、蓝、何、

蒋，到八九十年代的许多红学专家，尽管在其他一些枝节问题和个人恩怨上有许多矛盾，甚至势同水火，在这个问题上却表现了惊人的“一致”和“共识”：把一百二十回作为一个“整体”来谈论《红楼梦》的“思想”、“艺术”、“意义”，论述后四十回续书的“功绩”——而说来说去就那几句老掉牙的话。一曰续书使“残稿”成为“完璧”，有助于原本的流传；二曰续书把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婚姻写成悲剧，也写了抄家，有揭露封建社会黑暗的意义；三曰后四十回续书比众多“续书的续书”高明，为大众所认可，为历史所承认。这些道理都不错。但近百年对《红楼梦》的“意义”就反反复复地嚼说这种“常识”性的话头，对曹著和高续的“绝异”那一方面则停留在一般性的“说说”那种水平上，对其中包含的极为巨大的文化问题、美学问题、民族心理问题等“意义”麻木不仁、钝觉滞感，红学界的识力之平俗、思力之贫弱、境界之难超也就不言而喻了。

周汝昌感叹胡适“这样一位‘国学’大师，对文字笔墨的欣赏鉴别能力竟然如此其钝而不明，若非亲历，实难置信。”（《还“红学”以学》）其实又何止一个胡适？“文字笔墨”尚且无能鉴别，何况更深的“意义”问题呢？

真正的学术论争不能在高的学术层次上展开，于是“红学界”就经常被一些“形而下”的问题所困扰，在某种程度上难免造成一些“泡沫红学”的景观。

以最近十几年的例子说。在“小像”、“书箱”和“石兄”的锣鼓渐息之后，张家湾出来一块“墓石”，西北又“发现”几首“佚诗”，于是群情激动，众议喧哗，说“真”说“假”，轰动一时。本来类似于这种问题，无论是真是假，也只能算是红学的“边缘”，有其价值，但价值也有限，因为这与《红楼梦》的文本意义距离很远。对这些问题自然也应该研究讨论，但绝不应该成为红学的“中心”和“漩涡”。边缘成了中心，真正的中心问题

自然“门前冷落车马稀”了。这种局面的出现，社会传媒有其责任，但红学界自身的责任还是主要的。

如有一种喜欢弄轰动效应，爱发表声讨声明式的“治学”方法，对曹雪芹的伟大心灵扞格不通，对后四十回续书盲目崇拜，既批俞平伯“崇曹贬高”，又责李希凡“极左”，更攻周汝昌“误导青年”，好像左右逢源，其实连基本的艺术感受力和思考力也很欠缺，其深层思维模式的僵化、落后及受“毒害”之烈只能让人苦笑和叹息。

有三四位研究者分别著书立说，企图推倒胡适、俞平伯对脂批本《石头记》的考证结论，或说脂批本全系“伪造”，或曰脂砚斋故意作伪。本来学术无禁区，任何人都有提出自己学术观点的权利，问题是这些“研究”缺乏学术素质，不遵守学术规程，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顾逞臆非想，全无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和服善态度，而其根源，也还是识力、思力和艺术感受力的缺失。这些“研究”连前八十回和后四十回的文本差异这样一个显见的基本事实都无能分判或有意视而不见，更何谈《红楼梦》的“意义”询问？还有什么学术的高水准可言呢？

还有一种，爱红发痴，而治学基础不足，于是走入迷宫，“越钻越深越分析越有理越研究越有根有据其乐无穷自有天地”，由宁国府联想到故宫的台阶，进而得出林黛玉的原型是刺杀雍正皇帝的侠女，曹雪芹是反清的义士之惊世骇俗的结论。从学术自由的原则，这种观点也应有其一席之地，进入另一个思维系统，也可能产生意想之外的启发。但作为红学的学术主流，显然不能把舆论中心完全让位给这样的“热点”。

但为什么事实上竟然是一波接一波的“边缘”和“热点”占据了中心舞台呢？无他，根本原因是红学界本身的整体学术素质就有缺陷，故而无力左右局势，把红学引向真正的学术高境界。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从胡适、俞平伯开始，研究《红楼梦》